

景范先生史資料

第三輯



景德镇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景德镇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本辑编辑：石奎济 许文质

陈海澄

本辑审阅：刘懋典 王 遐

方 舟 陈绪庆

景德镇文史资料

第三辑

乐平县印刷厂印

开本：大32开 字数：180000 印数：1000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20元

目 录

军 政 史 料

民国早期景德镇的政治概况·····	姚润黎 (1)
陈安知事墓志铭·····	王言绶供稿 (13)
回忆景德镇“五卅”声援活动·· 焦守谦口述 徐镇寿整理 (18)	
回 忆 北 伐 北伐军到镇的前前后后·····	程 沛 (20)
回忆刘宝提朱子濂贺耀祖部先后过镇·····	杨石成 (24)
北军南军过境点滴·····	杨瑞开 (28)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景德镇的革命运动·····	
·····向法宜 姚甘霖 何燮 (31)	
都 乐 械 斗 都乐械斗始末·····	姚甘霖 (71)
都乐械斗目击者的回忆·····	方维新 (77)
都乐械斗见闻·····	杨瑞开 (81)
抗日时期的国民党浮梁县党部·····	程 沛 (84)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浮梁建团概况·····	杨永芬 (91)
抗日时期景德镇的征兵舞弊·····	刘劬非 (94)
抗日时期浮梁县的妇女工作·····	鲍转坤 (98)
浮梁县田赋粮食管理处片断·····	程光辉 (101)
抗日时期的粮食采购和贫民食米供应·····	熊正瑞 (106)
解放前浮梁县的各类合作社·····	程 沛 (109)

陶 瓷 史 料

- 从御窑厂到江西瓷业公司……………姚甘霖(115)
- 保槎公所与保柴公所……………彭 村(118)
- 恢复雄黄酒的斗争……………余新民(120)
- 饰瓷业工会的斗争概况……………赵运元口述 赵银旺整理(122)
- 浮梁县总工会训令(225号)……………赵运元供稿(124)
- 有关瓷商的回忆……………黄少眉(125)
- 杨福生瓷厂的经营发展……………杨石成(130)
- 民初磋窑窑碴的妙用……………梁聚淦(135)
- 记国产瓷用金水的诞生……………魏忠汉(137)
- 一百多种颜色釉技术资料的由来……………潘文锦(140)

文 化 史 料

- 饶河戏第一个女小旦的自述……………石祁香口述 陈海澄整理(145)
- 景德镇采茶戏老艺人刘尧生的一生……………曹达丰(167)
- 景德镇最早的堂会曲艺班……………汪士泾(176)
- 景德镇的曲艺种种……………夏巧亭(180)
- 回忆浮梁民众教育馆……………乔 木(190)

质 疑 · 订 正 · 补 充

- 对第一辑《景德镇文史资料》的若干质疑……………陆亚合(195)
- 第二辑《景德镇文史资料》的一些订正……………熊正瑞(197)
- 《竟成小学校史》补充……………孙 昌(200)

民国早期景德镇的政治概况

姚 润 黎

一、县 衙

辛亥革命前，景德镇设有浮梁县丞官署治理，其衙门就在今日的市人大办公楼那里。嗣后到解放前，都作为知事、县长衙门。县丞衙门建筑，远不及旧城知县衙门堂皇华丽；而且，知县衙门可开左、中、右三道，县丞衙门只能开一道。县丞的职权，仅仅是维持全镇治安，缉捕窃盗。它底下有很多捕快，专司侦破盗窃案件，它无权受理民刑诉讼。在都图制时，景德镇名叫镇市都。都设都长，都下面有图保长。如现在的四图里，就是原来的四图所管辖的地区。驻在离景德镇二十华里的浮梁县城的知县，在景德镇设有一个固定公馆，专为知县来镇理事住宿。其公馆建立在现珠山路中段，嗣后改作监狱。所以，景德镇人把这段街道叫做“公馆岭”。

辛亥革命后（1915年），县知事陈安呈准省长公署将浮梁县治由旧城迁到景德镇，从此，景德镇就成了浮梁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结束了几个朝代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隔离的局面。但是，由于孔庙大成殿无法迁来景德镇，所以每年春秋两季祭孔，县知事还要回到浮梁旧城去主祭。

县知事公署组织机构很简单，基本上还是沿袭前清师爷幕客制。辛亥革命后，虽在名义上设有第一科和第二科的机构，

一科管民政，二科管财政，但实质上仍是县知事聘请一位刑名师爷任第一科长和一位钱谷师爷任第二科长。由于当时景德镇没有成立法院，县知事还是兼理司法的，只是由江西省高等审判厅派一名承审员协助县知事审理民刑诉讼案件，但最后审判权还在县知事。县知事公署的附属机构，只有一个经征处，负责征收田赋及各种杂捐。其主任一职，每年例由浮梁县人推举，呈报县知事加委担任。原知县公署所设立的“三班六房”一些吏役人员，六房中还保留了粮房与书房。粮房每年要编造田赋征收通知单和过户手续，书房是负责抄写文件的录事。这些人员都是浮梁人的世袭职业。三班中的皂班则改称为法警。三班中门前稿，即传达兼收发，如熊式辉的父亲就做过门前稿。前清时，凡是任过县府衙门的三班佐吏的子孙是不准参加考试的，被认为身家不清白。

二、军 警

那时负责维持全县治安的武装力量，是县知事公署的一支保安队。人枪约百余，驻扎在县知事公署前面，直接受县知事的指挥。任保安队长时间较久的是龙德胜（南昌人）。由于景德镇是江西省的一个人口众多的重镇，所以省督军还派出北洋正规部队的一个警备营，长期驻防在景德镇。营部驻城隍庙，其他各连散住阎王庙等处。当时江西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所有警备营官兵都是北方人，素来欺压百姓，蛮不讲理，因此景德镇人对他们都有点畏之如虎。警备营职权不受县界的限制，为了剿土匪，它可派部队到鄱阳、乐平一带去。在景德镇，每日上、下午由该营派出一班人，手持令牌，荷枪从后街到前街巡逻一番。直到一九二六年，由于北伐胜利，这个警备营才随着孙传芳的溃退部队逃走了。

自戊戌变法后，清廷曾在大城市施行巡警制度的新政。辛亥

革命后，这一制度得到发展，并推广于中小城市。景德镇设立警察始于一九一二年。那时设立了左、右两个警察分驻所，以今日之珠山路为界，北属左分驻所，南属右分驻所。左分驻所就御窑厂官邸为所址；右分驻所原设在落马桥，因房屋让给电报局，后迁到何家窑苏湖会馆。分驻所的组织是这样的：上设警佐、巡官各一人，下设三个巡长，约有警士三、四十人，在前后街设有若干个警察站岗亭。警佐任职较久的是罗镜心（星子人），巡警学堂毕业。他能够写字做诗，不论大小绅士都能应付得好。他为捞钱而抓赌、抓烟，但从不敢触及有权势的。后他从右分驻所调到左分驻所。我还记得在一九二一年春节时，他自撰自书一幅春联贴在御窑厂左门上，写道：“数点梅花传信早，九年薄宦此栖迟”。

一九二四年，江西省警务处在景德镇成立了景德镇警察局，局址设在御窑厂官邸，原警察左分驻所则迁往宁波会馆。第一任局长是一个北方人，姓名已忘；第二任局长是李康。

三、教 育

自辛亥革命废弃了主管书院教育、考试秀才的儒学教谕官职后，初曾设立浮梁县劝学所，后改为浮梁县教育局。局址设在蛤蟆桥财神庙内。所长、局长例由浮梁人充任（劝学所第一任所长是陈畴，前清秀才，优级师范生，浮东京山村人）。任局长时间较久的有汪以正（浮梁西乡人，省一师毕业）。北洋军阀政府不大重视教育，那时教育局的编制，除局长外，只有二个职员，还有一个管理原考棚财产的收租员。但局长对学校人事不敢过问，至于教学质量如何，更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只是做他尸位素餐的官。在这一段时期内，景德镇虽然没有办中学，但有四所高级小学校、十八所初级国民学校。在这里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只有绍文小学能冠以“浮梁县立”，其他学校却称“景德镇××学校”？

这是因为，绍文小学是在戊戌变法时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中而将绍文书院改办成绍文小学堂的，它的经费来自县的教育专款。而其他各小学，都是在辛亥革命后由客籍知识份子创办起来的，创办时，带有半公半私的性质（如江起鹏创办模范小学，周凤笙从教私塾演变成时敏小学）。嗣后，这些学校的经费都在景德镇兴办的各种杂捐中来维持，主要的靠馆捐，由饮食店代征（即顾客吃一元钱食物，要交几分钱教育捐）。那时的教育有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新开办的学校生源不足，而教《四书》、《五经》、《幼学琼林》、《昔时贤文》、《三字经》等的私塾却有不少。此种现象较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突出。这说明景德镇交通闭塞，人们思想保守，对新学校、新教学法和新教科书，特别是对文体等课接受不了，认为送子弟到学校去认不了几个字，所以宁肯化钱送子弟到私塾去读书，有钱的甚至出重金送子弟到经馆（高级私塾）去求学。县知事公署曾一度查封过某些私塾，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事实上此封彼设，依然如故。主管全县教育行政的教育局，也对此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四、税 务

省财政厅在景德镇设立了统税局，局址在陈家街口（今第二医院门诊部）。所谓统税，是沿袭曾国藩为筹军饷所创办的厘金，就是在某些地区大批商品货物的进出口处，立关设卡，向货物征税，税率是很高的。景德镇是瓷城，故在此设局征收之。那时景德镇进出口的货物，全靠一条昌江航道，用木帆船运输。因此，统税局在西瓜洲这个咽喉之处，设立关卡逐船，所有装运进出口货物的船只，都要经过该关卡查验税票，与货物数量相符，才能放行。统税是省财政收入中除田赋外的最大财源。景德镇统税局的税收数目巨大，仅次于湖口二道口统税局。

辛亥革命后，废弃了清朝在景德镇所设立的官银号。嗣后建立了中国银行景德镇分行，行址设在麻石弄大街。当时，该行是纯粹的官僚金融机构，对民间不开展信贷业务，汇兑业务也很少。因此，来自全国各省的采购瓷器的客商的大宗汇款，都是通过景德镇众多的钱庄进行的。该行的主要业务，只是收解和划拨公款而已。

五、陈安知事

辛亥革命到北伐前，景德镇先后经过桂汝丹、陈安、韩兆鸿、何心澄、刘棠、邵贤南、梅钦光等七任县知事。在这七任县知事中，任期较长、对改变景德镇面貌多少做了一点事的，还要算陈安。

陈安，字仲亭，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幕客。他与当时江西省长戚扬是绍兴同乡。在陈安任内，戚扬曾乘帆船来镇巡视过。陈安接事后，除了将县治从浮梁旧城迁来景德镇这项较有远见的措施外，还有几项值得记载的：

一是开辟莲花塘。他选择了一处荒塚累累、人迹罕至、有山有水的山塘，将它开辟为风景游览区。这里素来是一些轻生者跳水自尽的地方，人们习惯称这里为东山寺。取名莲花塘，只是在风景游览区建成之后，因在塘中植满荷花故名。要将这里建成风景游览区，便要将塘水由死水变成活水。景德镇自古以来有一条很大的下水道。它的走向记不清，大约是从抚州会馆以上，经十八桥，到小桥，过大黄家弄，直到刘家弄下弄流入昌江。由于多年未加疏理，出口处也堵塞了。为了排泄莲花塘水，陈安大力疏通了这条下水道，并曾采取过严厉的措施。如刘振丰瓷厂在刘家弄的坯房的一道墙倒塌在下水道内，未及时清理，就被罚过重款。迨下水道疏通后，才在莲花塘做了一个闸门，将多余的水从接通

的下水道排出。水排出后，才开始建筑环塘道路，平整四周土地。这些土建工程，陈安多半是利用在押犯人服劳役而完成的。接着在塘中种荷，路旁植柳。与此同时，浮梁县立绍文小学从旧城绍文书院迁来景德镇，特在莲花塘建筑了三幢校舍，这给游览区也添上了一笔色彩。经过陈安一、二年的经营，莲花塘风景游览区初具规模了。当时的布局是这样的：在塘的南面，建筑了一个占地面积不大的新邑公园，公园内建筑一幢两层楼有走廊的房屋做饮食店，旁边又建筑一幢稍微高大而有厅堂的房屋，取名景德祠，祠内陈设着少数瓷器。园中央建有花台和亭子。在公园大门左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建有一个报时警钟亭，每天中午十二时鸣钟放炮。在塘北，建有三间平房，开茶社并卖小吃。在塘的中央，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筑有一道自南到北约百米长的堤坝，堤坝两旁，种有垂柳。在堤坝中间建了一座桥，桥上再建了一个约六七米高的、假两层的、四角飘檐的亭子，桥两旁护以栏干。堤后塘南建有一幢小建筑，为警察义祭祠。塘北也建了一幢两层楼的小建筑，名称我忘记了。塘的面积较现在要大得多。陶业管理局在莲花塘的一些建筑，那是三十年代的事。从此，每年春秋佳日，游人络绎不绝。特别是暑期夜晚，在新邑公园内纳凉、品茗、饮酒的人，真是坐无虚席。塘北茶社也是一样热闹。有些人宴请宾客，置办酒席，也多在新邑公园举行。

莲花塘曾经取名叫佛印湖。取名佛印湖可能仍始于陈安。为什么要取此名呢？一是“塘”显得渺小而不幽雅。如杭州的西湖，南昌的东湖，都称“湖”。二是过去这里有两大古刹，前为东山寺，后为五龙庵，又有宋朝名僧佛印驻锡的传说。于是在莲花塘入口处竖立了一座一米多高的刻有“佛印湖”三字的石碑。但佛印湖这一名称始终没有被景德镇人所接受，现在人们还习惯地称之为莲花塘。

二是禁止演戏。景德镇人来自国内十多个省和本省几十个

县。他们为了生计，离乡背井，旅居异地。那些来自同一地区的人，便很自然地以同乡关系结合起来，藉以保护自己，免遭欺侮。有的集合一省的同乡；有的集合府属各县的同乡；人多的就集合一县的同乡。他们分别在景德镇建筑以省、府、县为范围的会馆。这些会馆建筑的经费和会产，都是各地旅镇商人所捐助。会馆首士也分别由各地商人所推举。这些首士也就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绅士。各会馆内又组织这会那会，如关帝会等。这些会也是商人出资所组织的。会馆的戏台两侧，建有庑廊观剧包厢，每逢演会戏时，出了钱的会员和绅士都在庑廊内，边饮酒、边看戏。而一般平民只能站在戏台前面看。为了聚会祭祀，各会馆每年都在一定的日子里连续不断演戏。剧种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除了主要的饶河调（赣剧）以外，徽州会馆还请徽班演徽剧，湖北会馆则请湖北班演汉剧。那时，京剧还不为一般群众接受。由于各会馆经常地日夜演戏，也就不免带来一些社会治安问题。如有借演戏聚赌的，也有因看戏而打架闹事的，特别是工人因日夜看戏而产生某些怠工现象。所以陈安在一九一四年采取了断然的措施：禁止各会馆演戏。如果祭祀还愿的话，也只准演木偶傀儡戏。陈安这一禁戏令，为时很长，一直持续到大革命时期才开禁。陈安这一禁戏措施，虽然使当时社会治安得到相对安宁，但也取消了人们的正当娱乐。一些有钱的人，为了寻求娱乐，便找采茶戏看。当时采茶戏没有固定的戏班，只是由会演采茶戏的工人临时凑合而成。采茶戏行头简单，演出时，不用打击乐器，只需一个道筒，一副夹板和一只闹钹来伴奏，所以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地演唱。但如果被警察发现，演员也要被捉去化装游街示众的。

三是取缔私娼，设立妓院。在旧社会，大、中城市里都有“卖淫”的丑恶现象，景德镇也不例外。一些私娼（俗称花烟馆）散在殷若庵附近一带，依靠着匪钵厂（乐平人）的保护，还往往由

于争夺私娼保护权，人们互相打架闹事，有时狎客也遭波及。陈安有鉴及此，大约在一九一四年，仿效上海、南昌等地的做法，取缔私娼，由政府抽收花捐，鼓励某些人公开设立妓院。妓院设立的地点，上街被指定在老弄口、南门头下弄的泗王庙和祥集弄下弄等三处；下街则指定在富商弄一条横弄。妓院数目，上街有二、三十家，妓女近七、八十人，属于扬帮；下街约有四、五家，妓女约二十余人，属于本帮。每家妓院都将它院内的妓女姓名分一、二、三等分别写在牌子上，悬挂于大门之上。所谓扬帮，就是由龟头鸨母从江苏扬州买来或雇来的少女；本帮则是从上饶、河口买来或雇来的。妓女可被指名叫到餐馆酒楼陪酒，也可被叫到家里清唱。陈安这种措施，固不可取，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他也不可能消灭这种社会丑恶现象。

六、浮梁公所

自一九一五年陈安将浮梁县治迁来景德镇后，接着，浮梁县劝学所和浮梁县立绍文高等小学校也随之迁来景德镇了。从此景德镇的单纯经济中心，演变成了浮梁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但是在这个经济中心里，不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来景德镇经营的。特别是在流通领域里，招来了全国十多个省的客商来景德镇采购瓷器。当年各瓷厂、客商批购瓷器的帐簿，封面都写上“万商云集”。相反的，浮梁人在景德镇经商的却成了极少数。经营瓷业的浮梁人在景德镇市更属凤毛麟角了。浮梁人经商的，加入商会也是编在“杂帮”之列。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浮梁县的政治文化中心历来都在距离景德镇二十华里的旧城，因而地方也就受到封建王朝的“重本抑末”政策思想的影响。加之卫生条件的限制，浮梁农村人口不是随时间而增长，相反地随时间而减少，所以世居

景德镇市都的浮梁人就越来越少了。

由于浮梁县的政治文化中心迁移到景德镇，浮梁地方的士绅也就失去了参与县政的凭藉。原先曾设立县评议会和都、图制，到辛亥革命后，县评议会撤销，都、图制也逐渐失去它原来作为基层政治机构的作用，只是在田赋上沿用都、图造具纳税人花名册。有时县知事要召开公法团体会议，景德镇总商会及主要的同业公会当然是参加者，但在景德镇的浮梁人没有一个代表自己的法人团体。在这种情况下，浮梁士绅汪龙光等（汪系前清举人），便发起成立了一个浮梁公所，并集资在罗家坦（今青石街石狮埠街委）建造了二幢占地二千多平方米的砖木结构的大屋，作为浮梁公所所址。

浮梁公所组织，没有成文的具体章程，也没有向县知事公署正式呈准立案，只是“约以俗成”。县知事也承认浮梁公所是一个代表浮梁人的具有法人的团体。至于具体组织形式，据不成文规定：设董事十人。其名额分配，由东南西北乡，各出二人。其余二人，由浮梁旧城和世居景德镇的浮梁人选出。再在十个董事中推举一人作为常年驻所董事（也称总董），对外代表浮梁公所，对内总揽一切。董事开会也无规定期限，有事就由总董召集开会。历任驻所总董人选，我现在记不完全，只记得汪龙光、蔡绣贤、吴秉良、严明等人担任过。在此之前，征收田粮的经征处，兼负责经理地方财产收入（设在厂前关帝庙），其经征处主任一职，按照向例由浮梁人担任。即由东南西北乡轮流选人充任，任职一年。过去由各乡都图推举，浮梁公所成立后，便改由浮梁公所推举。

浮梁公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代表浮梁人的具有法人的团体，能出席县知事所召集的公法团体会议，还能代表原来的“都图”的职权。另一方面，它又带有招待的性质，其招待范围，只限于浮梁四乡地方的士绅来镇住宿和膳食，其他不驻所的董事也可长期居住。此外，浮梁四乡到南昌等地或外省读书游学

生，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途经景德镇的，浮梁公所也招待食宿几天。至于其他四乡来镇的一般农民，那是不接待的。因此，浮梁东南西北四乡，也先后在景德镇购房屋，成立各自的公所。这样，各乡来景德镇的农民，如无亲戚落脚之处，就可到各乡公所住宿了。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进驻景德镇，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浮梁公所的某些董事，是农民所憎恨的土豪劣绅（如蔡绣贤），他们怕被打倒，都逃遁到乡间去了。于是，浮梁公所就改作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浮梁县党部和浮梁县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市党部随市的建制撤销而撤销，国民党浮梁县党部迁到龙珠阁，浮梁公所才又恢复了过去的董事制。

不久，浮梁县成立了县财政委员会，经理地方预算外财政，历任委员长范云初、钱学起、汪乃斌等，他们都是浮梁人。嗣后又成立了县参议会，议长蔡树勋也是浮梁人。所以浮梁公所也就失去了原先成立时的作用。加之，浮梁公所的房屋后来长期被浮梁团管区司令部所占用，于是连招待所的性质也消失了。所谓驻所董事，实质上成了一名财产保管员。

七、景德镇建市

用“景德镇市”冠称的机构，始见于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国民党景德镇市党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一次吴瑶笙见到市党部招牌问我：“景德镇是否要建市？”我说：“马上要建市。”他说：“那就好，我们总商会向省长公署争取了好几年要建市，都没得成功。”不久，省政府派张田民为景德镇第一任市长（张系乐安人，思想倾向无政府主义，在南昌开了一爿小型印刷厂）。他于一九二七年一月间到景德镇，筹组景德镇市行政公署，公署设在御窑厂官邸。市无财政收入，机关费用靠省拨款。

由县行政公署领导的两个警察分驻所，改归市行政公署领导。当时县长兼理司法。所有市民民刑诉讼，仍由县行政公署管理。对于市政设施，张田民只拆掉了御窑厂头门。由于御窑厂停办，头门成了游民乞丐栖息之所，弄得稻草狼藉，龌龊不堪。且头门又是行人通街之道，确实是妨碍市容观瞻，把它拆掉是应该的。

一九二七年南昌“四·二”反右斗争胜利后，省政府改组，以两面派朱培德为省政府主席。因此省政府将张田民调省，派王尹西为景德镇第二任市长（王系万安人，原为第六军五十六团团长）。当时有一股散兵游勇散在浮梁东乡曹村一带，这些散兵游勇系北洋军军阀孙传芳部队溃退时散落下来的，约人枪百余，由余杰率领。他托人向市党部要求收编。于是市党部与王尹西研讨，决定收编为景德镇市人民自卫团，由余任团长，作为市行政公署的直属部队。

不久，都乐械斗这幕悲剧开演了。王尹西为应付这幕悲剧，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也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市政设施。后来，由于党内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乐械斗这幕悲剧以不利于革命的方案处理而告终，且连带还把市行政公署撤销了，市长王尹西也就被调回省了。

宁汉合流，“八一起义军”撤离南昌，标志着大革命失败。两面派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暴露了反革命本质。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初，他派平宝善为第三任景德镇市市长（平系九江人，属于国民党右翼）。此时市行政公署改为市政府。御窑厂官邸已做警察局址，市政府就设在莲花塘逸兴公园内。平宝善做了二件事：（一）由于都乐械斗这一幕悲剧，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相当，人们在痛定思痛之际，推究这幕悲剧产生的原因，于是一些堪舆家大放厥词，把这一幕悲剧产生的原因，归咎于市行政公署不该拆御窑厂头门。胡说什么：“景德镇地形是九龙抢珠，这个头门就是关住九龙不得作乱，拆了头门，就等于放出孽龙来了，今后景德镇

还会出乱子。”一些士绅也就相信堪舆家的迷信说法，纷纷向市政府建议要修复头门。在这情况下，平宝善也就照原样重新建造了头门。(二)景德镇是一个几万人口的城市，但是没有一所中学。每年小学毕业生升中学的话，近到鄱阳，远到南昌、九江，甚至个别还有到上海、武汉等地的。因此，平宝善呈准省教育厅设立景德镇市市立中学。由于汤有光与平宝善是两江师范同学，遂委汤有光为市立中学校长，并负责筹办。当时市财政收入有限，也就因陋就地借用何家窑新建的时敏小学为校址（后迁到莲花塘）。

大约在一九二九年上年，平宝善被调任九江市市长，省政府没有派人来继任，景德镇市的建制也从此撤销，仍为浮梁县管辖下的一个镇。